

台州百匠探奇 ④

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实习生何沁茹/文
杨 辉 实习生池 糖/摄

吴建江：
妙手「画医」

如果说装裱之于书画，犹如化妆之于美人，那么古籍旧画的修复，则上演着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绝妙技艺。修复的过程，如同进行一场精密的手术，消毒、蘸水、清洗、揭裱、刷糊、修补、全色、装裱……需经过180多道工序，终于在书画装裱修复师们的妙手回春下，一幅幅破损的作品得以“重获新生”。在仙居田市，便有这样一位妙手“画医”，名叫吴建江。

具补天之手

恒温恒湿的工作室内，一切都安静。“干我们这行的，需要心比较静。”吴建江说完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几份破损的民国时期的执照、地契，一仔仔细细铺于桌上。



在吴建江的日常工作中，会收到各种各样的“委托”。包括书画、碑帖、古籍在内的纸张相关的物件，在收藏、保存的过程中常常因受潮发霉、虫蛀鼠咬、绢纸老化等问题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，而这，就需要书画装裱修复师们出手，令其“起死回生”。

只见吴建江拿起一个小喷壶，将清水均匀地喷洒在执照、地契的表面，这个看似“搞破坏”的行为，其实是修复过程中十分关键的“清洗”环节。

从清洗到揭裱到修补，修复的每个步骤都要分外小心。特别是一些古旧书画、碑帖作品，通常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，这就要求装裱修复师们在操作过程中，每一步都马虎不得。吴建江曾修复过一幅画家倪云所绘的《富贵神仙图》，“拿到手时，这幅画的纸张霉烂已十分严重，力气稍重一些，甚至会掉落碎片粉末，修复难度很大”。

难度大，便意味着挑战，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成就感。

胆大、艺高、心细，这是书画装裱修复师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。正如明代周嘉胄所撰《装潢志》中说：“良工须具补天之手，贯虱之睛，灵慧虚和，心细如发。充此任者，乃不负托。”

好的书画装裱修复师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全科医生，面对“患者”的不同问题，总能对症下药，下手精准，吴建江亦如是。

“在修复齐白石之子齐良末所画的《虾》时，因为作品在保存过程中处理不善，并且装裱时用浆过浓，导致画面已出现多处明显裂痕，多个局部缺损。”吴建江回忆。



▲吴建江在修复一件明代的书法作品。

修复开始，吴建江将作品铺在平整的桌面上，画心正面朝上，清水喷洒，使整幅作品被清水浸泡，易于移动复位。之后，便是揭覆背纸、命纸。针对这件作品的破损情况，吴建江采用了搓补法和刮补法进行修补。完成修补后，还要上墙绷平，将断痕处进行加固。“为解决原来装裱用浆过浓的问题，我们在修复时尽量做到用糊恰到好处，使裱件达到平、挺、软的要求。”他说。

又如另一幅明代王铎的草书作品，霉变严重，且出现多处脱壳、粉化现象，因而吴建江在对作品进行冷冻消毒后，“经过综合考虑，采取先洗后揭的流程，将作品上墙后，使用刀刮法去除黑霉”。

书画修复的工艺繁琐，工序复杂，对吴建江来说，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步骤，便是全色。“要实现画面的完整统一，全色是关键。而颜料的选择，颜色的调试，就需要花费比较多的心力。”好的全色，能使修复后的作品在视觉上达到严丝合缝、浑然一体的效果。



▲调试颜色



▼全色

不过，让作品恢复“原貌”很重要，但修复过程中的“修旧如旧”和“可逆性”更为重要。

吴建江解释：“修旧如旧，也就是书画的原始部分我们是绝对不能动的，缺笔处我们只全底色而不接笔，修补的地方还要与原画色调、意境保持一致。可逆性的目的，也是为了最小程度改变书画的价值和信息，让后人在欣赏和研究时，能够得到最原始的信息。”

为了追求细节上的完美，再加上

修复步骤环环相扣，严谨有序，吴建江的修复工期通常比较长，最短的要十几天，长的要数月，甚至数年。比如完成《虾》的修复，吴建江就花费了3个月的工夫，而修复另一幅《天官赐福图》，他前后历经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
非朝夕之功

1995年，27岁的吴建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

一边是已经小有成就的武术事业。“我成长的年代，社会上学武的风气十分兴盛。在父亲和兄长的引荐下，16岁那年，我进入福建省三明市武术队学习。后来，我又考入郑州少林武术专修学院。”

从武术学院毕业，因为成绩优异，吴建江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，他是省一级拳师，培养的学生曾在省级散打、套路比赛中名列前茅。回到家乡仙居田市，吴建江还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民办武术学校。

另一边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——书画修复。如此“跨界”，等于放弃之前所有的努力。但对于彼时的吴建江来说，一切都是值得的，“我的性格偏于安静，并不想一直走武术这条路。我要感谢我的父亲，想学书画装裱修复，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。我父亲也很支持我这个决定”。

于是，吴建江义无反顾地扎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经朋友引见，吴建江认识了西泠印社装裱大师钱立新老师，并成为钱立新的关门弟子。

从入门到扎根，从学习到授教，吴建江孜孜不倦地学习、实践。如今，他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将近30年的光阴。多年来，经他之手修复的明、清、民国、现代书画，古籍珍本、善本达300多件(套)。那些被时间蚕食所留下的痕迹，通过吴建江的修复，被一一抚平，重现旧时华彩。

书画装裱修复是一门古老的传统手艺，而要想将这门手艺延续并发扬光大，吴建江深知这并非一时之功，还需紧跟时代变化，要有创新思维。2008年，他成立了“仙居柏楠书画装裱社”。2014年，“仙居柏楠书画装裱研究所”落地田市镇。

选择田市镇，不仅仅是吴建江的“乡情”使然，“田市是我的祖籍。当然，这里风景优美，人文气息浓郁，历史上出了诗书画‘三绝’的柯九思、明御史李一瀚等名人。”田市镇也热情拥抱了他，给予鼓励和支持，希望通过文化赋能乡村发展，带动当地人文乡村建设。

负责监督西路军。

在对战过程中，因明军有人泄密，导致西路军将领刘进攻击失利。有侦察者来报，说“中路泗水败仗”。这时，军中士气大减，有崩溃的迹象。关键时刻，王士琦挺身而出，说：“且大军方与贼对垒，而监军使者无故先遁，万一批传而师溃，谁任其咎？吾今惟有誓死报国耳。有异议者，立斩以徇。”并把这位侦察者绑了起来，由此军心得以安定。

前方的刘进见王士琦强硬不肯撤退，干脆破釜沉舟，与敌军力战，扭转了战局，这才有以后克栗林、夺曳桥的胜利。朝鲜朝野出于对王士琦钦佩至极，为他在全州立去墓碑作为纪念。

王士琦官至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大同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)，他奉调巡抚江南，途中感染疾病，卒于渚源(今属山西省大同市)。他去世时，“柩无长物，旅旌萧然”，意思是口袋里没什么钱，下葬的棺木也很简陋。

3年后，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。

如今，研究院下已有柏楠书画装裱社、柏楠书画装裱修复培训中心、古籍修复培训中心、金石拓培培训中心等多个平台，承担着书画装裱修复、古籍修复、金石拓培等专业人才的培养。

来这里学习的，既有刚成年的青年人，也有年逾古稀的老人，“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学员已经有1300多人，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，甚至还有法国、澳大利亚、意大利等国的学生。”吴建江说。

同时，研究院也承担着社会教育和大众科普的责任。这里先后被评为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、台州学院艺术与与设计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基地、台州市中小学生学习实践教育基地，累计研学体验接待一万多次。

现在，走在研究院内的小路上，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重新装修布局。未来，新的工作室和展示厅建成，可以更好地呈现书法碑刻、古画古籍作品，也能提供更完善的研学活动，为学员和参观者带来更多美好的体验。

【手记】

也许是年轻时练武留下的痕迹，56岁的吴建江看起来依旧十分健硕。

只是如今他的“十八般兵器”，已经从刀枪棍棒变成了案桌上的针锥、竹启子、镊子、钳子、剪刀、角尺、美工刀、研石、大小棕刷、喷壶、电吹风……

对吴建江来说，干这一行，成就感是远远大于辛苦。

一来，这是他喜欢的事情。二来，书画、古籍等文物的修复，会有一种自然而来的荣誉感——在守护文物的同时，也在守护着民族的历史。

实际上，中国书画能够一代代延续保存至今，其中一个关键，便是历代书画装裱修复师们的参与和努力。“当我们处理一些保存比较久的古画时，还能看到一些前人修复过的痕迹。”修复的过程，便是与文物、与古人，与历史对话的过程。从前人手中接过这份使命，细心整理、修复好一幅幅残损的书画，将它们送往下一个十年、百年。

三来，他所坚持的传承事业，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门手艺，也带给许多人就业、创业的可能。

在精素墨迹间，能够找到心安之所，是幸事。

青山脚下，与古为友，专于一业，兀兀穷年。

田野寻访

长沙巡检司城

潘昌来 文/摄

长沙古村，位于临海市东部沿海，台州湾北岸的连盘港口。《台临长沙周氏宗谱》称此地前有剑山(又称冬瓜山)为屏，后依凤山耸秀，左边龙山喷水，右有伏虎镇邪。当然这里还有田地可耕，渔盐可作，可称“桃花源”了。

此宗谱又载，宋末元初，理学名儒周濂溪的七世孙开公，任御史中丞，屡受佞臣妒，于是就解绶归里，后游玩至海涂时，看中长沙这个好地方，有耕樵渔盐之利，是后裔子孙的发展之地，遂弃官隐居此。

明代洪武初年，海氛不靖。有倭寇骚扰北方滨海各郡县，继犯江浙等东南沿海。到了洪武十七年(1384)，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疆，他接受了方国珍侄子方鸣谦的建议：“倭海上来，则海上御之耳。请量地远近，置卫所，陆聚步兵，水具战舰，则倭不得入，入亦不得传岸，则可制也。”遂在边海地带设卫所，置巡检司。

长沙东边的连盘港口，舟楫往来频繁，商贸兴盛，旧有谚语为证，“桃渚港口两分流，连盘道头小杭州”。这里又是海防要冲。于是在长沙村前的剑山上建起巡检司城，土城环山，周长一千多米，城宽约七米，高约六米，设东西两城门，内有官衙、营房、水井、马房等。明代的巡检司，职责就是盘查往来行人，缉拿盗贼等，维护地方治安。

当时在巡检司周边的山顶上建还有烽火台，如东边的轻盈山，前边的竹峙山，西边的市场山，后面的百亩地山。有敌情时，可燃烟火相传报警到桃渚所城、海门卫、台州府。

据《戚少保年谱序编》中记载，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)四月十五，倭寇数百人从连盘登岸，流劫海滨村庄，戚继光命材官汤时茂的士兵一哨(约50多人)为前锋，自己亲督各兵为二路分头策应，是日兵到薛岭，距离离寇五里时，倭寇害怕了，企图向停船的地方奔跑退却，但戚继光率兵水陆并进，铗弹齐发，火烧敌船，溺毙殆尽，擒斩五名，其余各亡命争抢民船逃遁。

剑山上有城隍庙，传说建庙的屋料来自枸橼寨。枸橼寨在上盘的轻盈山上，里面聚集着一帮盗贼，时常下山抢劫，危害周边的百姓。后有官兵上山清剿。由于山高路陡，寨周围以枸橼刺丛为墙，官兵都攻不进去。时大汛后洋的杨文，卖笼担(小百货)，见此情景，报告官兵，他有办法，如此这般可攻克枸橼寨。一天，枸橼寨边来一个卖笼担的，与寨里的人做起生意来。闲谈间，他指着寨墙，说这上面种白扁豆多好，又不占地方，摘来亦好吃，一举多得。寨中的人听后，觉这主意不错，在周边的墙脚上遍种白扁豆，一时间枸橼树上爬满了豆藤。到了秋后霜降，枯萎的豆藤与枸橼树缠连一体。入夜后，官兵偷偷摸上山，点燃了豆藤，树干火旺，浓烟滚滚，一时间烧红半边天，官兵借机冲了进去，剿灭了贼徒。后来把贼窝拆了，屋料运到巡检司城，建起了城隍庙，祈求平安喜乐。

到了清朝末年，巡检司城已成荒芜之地，周氏后裔学楷公精通文墨，见此百感交集，作《城隍故墟》以纪念，诗曰：“明王有道爱群生，海口红苕七二城。旧垒萎青春草没，故墟寂寞夜鸟鸣。岩间古庙遗神像，云里孤峰绝旌旗。今日犹留前事迹，四夷无复动干兵。”

四百多年过去了，战争硝烟已经散去，曾经屹立的土城，也只剩下东门山边的一小段。1953年，城址地下发现有断瓦，那是烧断瓦的原料，于是人们争先恐后挖掘，结果把城墙也挖去了。但从城墙中还挖出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刀、石箭头等文物(入藏临海博物馆)。

假如巡检司城完整地保存下来，作为明代的基层军事设施，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。

顺着在岩壁上凿成的踏步，登上剑山顶上，站在城隍庙前，曾是苍茫一片的海涂，如今已经阡陌纵横、屋宇连片的烟火人家。



▲巡检司城里的古井



世渊说史

王士琦墓

吴世渊 文

王士琦墓，位于临海张家渡王庄山。1956年4月，张家渡农业社一位社员以家中盖猪圈、粪坑为名，搬移王士琦墓前的一块石板，想带回家用。

谁知，石板挪开后，他发现墓中有一大堆金银器。当地有知情群众立刻向文物部门汇报，临海文物管理小组前往墓地勘探，并将出土的文物收回。

后来，王士琦墓出土的107件随葬品，移交到了浙江省博物馆。这些文物中，有束发金冠1件，金带板20件，各种金饰包括戒指、耳环等33件，各种杂金饰连宝石、玉、银29件，各种银饰20件，青花小方瓷盒1件，银花1件，玛瑙虬龙佩1件，唐海玉葡萄铜镜1件。1995年，经国家文物局鉴定，其中22件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一座明代的古墓里，为何会出现这么多宝物?墓主人到底什么来头?王士琦(1551—1618)，字圭叔，号丰舆，台州临海人，万历十一年(1583)

进士。他的父亲王宗沐，是嘉靖年间的进士。他的两位兄弟，王士崧、王士昌，也都是进士出身。“父子四进士”，在当时，朝野都为之侧目。

史书将王士琦评价为明末军事家、一代名将，但他仕途之初，其实是文官。考中进士后，他历任南京工部主事、兵部郎中、福州知府。

万历二十三年(1595)，王士琦在重庆知府任上时，遇贵州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谋反。于是，他单枪匹马前去招降，将此事平息。这般的勇有谋的举动，也获得了上峰青睐，王士琦因此被提拔为四川按察副使。

而真正令他威名远播的，是在他万历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。
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，日本14万大军入侵朝鲜。在朝鲜的求援下，明朝调7万兵力赴朝。次年，王士琦以监督朝鲜全罗道兵马的专责，渡过鸭绿江。彼时，明军兵分三路对付倭寇，王士琦

朝廷认为，王士琦在任期间有功，就赐他厚葬，“遣官营其葬事”，这才有了墓中如此多的随葬品。

王士琦墓出土的金银器、器类、纹饰都比较多样，可以说是一批重要的标本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扬之水评价说：与王士琦同时代的北京定陵和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墓，所出金银器镶嵌玉嵌宝，雍容典重，代表着明代后期的宫廷样式；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在题材、样式、工艺等方面与宫廷作品都很相近，并且也以嵌玉镶嵌为点缀，不过远逊于“内造”的金碧辉煌，总体风格是纤丽秀逸，工致细巧。

2017年，王士琦墓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墓里出土的金银器，则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。

参考文献：《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的样式与工艺》/扬之水、《明援朝抗倭胜之管见》/马曙明、任林豪